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论坛

Humanitas at Fada

第一辑

Vol.1 (2004)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

第一辑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ISBN 7-5004-4525-3

I. 中… II. 中… III. ①人文科学—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40976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冯慧茹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创意 英 堂
封面设计 邵志锐
封面制作 乔 敏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水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35.63
字 数 600千字 印 数 1000册
定 价 60.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春风化雨 寄托人文

又是春暖花开，又是一度新春。

在 2004 年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季里，《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一辑终于面世了。

奉献给学界的《论坛》，可能是姗姗来迟了，但又应运而生，生逢其时。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向多科性、研究型大学转型的学术结晶，《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将立足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从整体上反映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术应有的新气象、新形象。

目前的《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将着力编好以下五个特色栏目：

——人文论衡。主要发表有学术深度和研究力度、反映学术前沿水准的专题学术论文。对于优秀研究成果，原则上不限字数。接受校外学者稿件。

——学术评论。主要发表针对某些学术文化现象、学术论著的研究性、讨论性的学术批评力作。每辑发表 5—8 篇，每篇一般不超过 2 万字。接受校外学者稿件。

——文化视界。发表文学、历史学、哲学、新闻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相关文章。每篇一般不超过 6 千字。主要发表本院教师成果，一般不接受外稿。

——学科建设。主要发表与学科建设、学术建制、人才培养以及教学、教材等相关的成果。

——学术信息。主要发布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重大学术动态、学术成果信息，并适当兼顾学术界相关信息。

我们的目标和理想是，经过脚踏实地的努力，用 5—8 年的时间，把《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办成面向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权威性的公共学术园地。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暂定每年一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们由衷欢迎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关心与支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编委会

2004 年 2 月 29 日

于北京昌平

目 录

春风化雨 寄托人文……《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编辑委员会（1）

·人文论衡·

数码时代的人文学术 陈平原（1）

21世纪中国史学的创新问题 郭世佑（11）

论孟子思想的多元性 刘斌（17）

《邦联条例》初探 胡秋红（27）

学问中的证与悟

——陈寅恪、唐长孺先生对《桃花源记》的解读 张伟然（66）

论傅玄的文学创作 罗世琴（72）

子弟书艺术新论 崔蕴华（107）

论逻辑批判 王洪（126）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资本论》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张秀琴（137）

·学术评论·

评目前的学术量化管理体制及其流弊 黄安年（148）

一篇荒腔走板的“博士论文”

——评《传统武德及其价值重建》 周伟良（165）

再评《俄国文学与宗教》 左少兴（188）

一部不折不扣的抄袭之作

——评《艾略特——不灭的诗魂》 钟山虎（207）

就《反思纳税的中国语境》澄清一个事实

——再谈剽窃现象肆虐我国学界 肖雪慧（217）

司法不公何时休？

——从本人维护《中国悬棺葬》著作权的遭遇说起 ... 陈明芳（228）

对“生存论本体论”的质疑

——与贺来教授商榷 文 兵 (240)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的奠基之作

——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李秀英 (249)

·文化视界·

中国哲学的生态智慧与中国发展的道路 刘文英 (264)

中国文化建设论略 王湘军 (276)

近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新陈代谢 姚雨虹 (284)

文人政治意识与近代社会变革 刘媛媛 (299)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刘晓兵 (306)

网络时代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傅 扬 (313)

对现阶段中国人生存状况的忧思 程美东 (319)

当前中国国际定位与外交战略分析 (英文) 卫 灵 (323)

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法的价值 常绍舜 (331)

唯物史观的应用得失及意义扩展 李凯林 (337)

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及其特点、缺失 郭德宏 (345)

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及其演进 李云智 (352)

传统“诚信”思想及其启示 马华山 (361)

对法制新闻的价值的思考 姚广宣 (368)

关于法律新闻报道的若干问题 贾蕴菁 (375)

新闻侵权的法律问题 项 云 (388)

新闻“把关人”与媒体对“非典”的报道 阴卫芝 (401)

受众行为的反沉默螺旋模式及其成因 刘徐州 (410)

女权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流派 张艳红 (420)

伟大的语言呼唤严谨的语言学研究 莫大伟 (431)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初探 赵文彤 (441)

莫言暴力叙事中的残酷美学 杨 阳 (450)

2003年：人，诗意地上网 于怀玉 (458)

第七艺术——电影的鉴赏 孙懿华 (466)

中西造型艺术比较论 邓志锐 (475)

·学科建设·

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培养制度

- 以历史学研究生的培养为例 王 希 (495)
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初步总结 赵晓华 (508)
《逻辑悖论研究引论》的学术贡献 王建芳 (517)
《美国文明》述评 孙洁琼 (523)
司法口才学学科体系初探 周广然 (531)
大学书法教学的若干体会 毕可鹰 (535)

·学术信息·

- 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543)
中国政法大学学术规范 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 (548)

筚路蓝缕 开拓创新

- 朝气蓬勃的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金 鑫 李艳艳 (551)

- 编辑札记 杨玉圣 (556)

数码时代的人文学术

陈平原

21世纪中国的人文研究，必将面临诸多挑战。这其中，有的是延续百年的文化转型，比如走向专门化过程中如何坚持知识分子立场，以及西方理论框架与传统学术资源的调适；有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大众传媒的迅速扩张与学院派姿态的紧张，重建学术规则的努力与超越规则自由驰骋的冲动。但更值得注意的，还是20世纪末崛起、且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的互联网（Internet），其必将改变21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及精神风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电脑及网络技术日新月异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震撼，在欧美世界已多有论述。受科技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五年前我们对这话题还很陌生，基本上将其作为科学幻想小说阅读；可现在却是如此迫在眉睫，以致你无法不认真思考。因为，中国也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数字化生存”大潮之中。今日中国的城市青年，见面时的问候语，极有可能不再是“吃过了吗”、“出国了吗”，而是“上网了吗”。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中国拥有电脑以及上网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低，但绝对数目极大，而且增长速度惊人^[1]。从专家们正襟危坐谈论那神秘兮兮的电脑，到媒体上铺天盖地关于网络的文章，总共才几年时间^[2]。网虫们早已经上天入地四海遨游去了，即便后知后觉的我辈，也可借助一册《Internet上的各类常用资源》^[3]，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各有关站点。

以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为例，七年前开始规定教师晋升职称时必须通过电脑知识考试，那时文科教师中使用电脑的仍属少数；五年前北大校园网连入Internet，教师们可以通过家庭电脑拨号入网；三年前研究生大都使用电脑储存资料并写作论文；一年前学生们可以在宿舍里自由上网，漫游虚拟空间；2000年初以来，校方创建的包含远程教育、学术动态以及数据库的北大在线（<http://www.beida-online.com>）、中文系主持的拥有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等学术资料的北大中文系（<http://chinese.pku.edu.cn>），以及中文系研究生自己制作的专门搜集、刊发学术书评的燕园书网（<http://www.yanyuan.org>）。

bookynet.com) 相继开通。时至今日，网络离我们越来越近，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直面其存在。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今日中国的人文学界，已经不再将借助电脑或网络从事学术研究的尝试讥为“雕虫小技”，而是切实感觉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阅读以及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

对于这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变化，目前中国学界基本上是一边倒，除了惊讶、赞叹，就是呼吁国人不可错失良机，赶快搭乘狂奔于“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时代快车”，而很少思考技术进步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4]。反而是书店里颇受欢迎的译作，偶有提醒人们不可过于乐观的。比如摩尔(Dinty W. Moore)的《皇帝的虚衣》(The Emperor's Virtual Clothes)，便对时下流行的关于网络功用的夸张表述表示不以为然，称因特网确实给人类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不该故意回避，但无论如何“它却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作者坦承“我留恋真实的世界以及它那迟钝的缺陷”，而且希望读者与他一起停下车来，“仔细地端详眼前的那一片风景”^[5]。考虑到本书作者并非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而是一个在大学里教授文学创作的作家，其欣赏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因特网保持警觉，很容易被讥为只具有审美意义的“文人习气”。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狂飙突进相比，摩尔在中国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如《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未来时速》(Business @ The Speed of Thought)的中译本同样获得巨大成功，很快成为时尚读物。其关于电脑无往而不胜的神奇渲染，俨然成为国人心目中的“金科玉律”，被屡屡引用。尤其是教育界，更是不敢忽略其预言，即假如为每名学生配备一台电脑，则：“获取数据的能力和分析数据的便利使得信息的内容深刻广泛，从而提高了基本的技能，例如写作能力和分析能力。学生们通过更多的观点来查看和检索更多信息，从而更有意识地去批判性地观看数据来源，并做出独立判断。”而“关于学校电脑的十条确凿启示”，全是正面效应，更是振奋人心。但我怀疑，如此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变革，可能吗？别的还好商量，第八条启示“电脑并不削弱传统的技能”^[6]，便实在令人费解。

作为人文学者，我不能不对电脑/网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极为敏感。这是因为，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研究（包括教学）更多地承担继承和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重任。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无法抹杀这么一个事实：阐释和传播经典论著，并致力于保存与转化我们所谓的“传统”，始终是人文学者的重要使命^[7]。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暂时搁置更带根本性的网络对于人类伦理道德、情感世界、时空观念等的挑战，而将命题局限在其如何影响传统的承传与人文学的研究。

电子版图书的大量出现以及数据库的迅速扩张，使得原先需要耗费极大

精力才能实现的“占有大量资料”，不再是研究中的最大障碍。假如你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那么，台湾中央研究院（<http://www.sinica.edu.tw>）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http://www.chant.org>）这两个站点，绝对值得访问。前者的“二十五史”等入库资料，以及后者藏品日丰的“古文献资料库中心”，在大陆学人中声誉甚隆。随着时间的推移，像这样拥有大量经过认真整理、使用极其方便的学术资料的站点，必将大为增加^[8]。再加上电子版《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的问世，使得“古书重焕了青春”成为现实^[9]；《新青年》《国闻周报》等全文光盘文献库和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梁漱溟、马寅初等著述及研究资料全文光盘的出现，又为现代中国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于提供专业文献信息服务的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在目前的中国，因带宽小、传输率低，加上绝大部分图书是按页保存的图形文件，没有经过OCR识别，读者花费多而得益少，故使用率不高；但谁也不敢否定，作为“信息时代的知识英雄”，数字图书馆前程远大^[10]。以目前的发展速度，用不了十年，除了机密档案，大部分的传世文献将变得“唾手可得”。这是前代学者做梦也无法想像的——想想诸多流传已久的关于文人雅士历尽艰辛访书、借书、抄书的故事，如今足不出户便能完成，不难明白这世界确实变化快。

资料公开且索取方便，“博闻强记”因而不再是成为第一流学者的主要条件。这一新局面的形成，使得研究中占有资料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独立思考、怀疑精神、批判意识以及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需要”不等于“可能”，而且，“独立思考”与“批判意识”任何时代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不特别苛求或青睐于网络时代。在我看来，对于网络时代的人文学者来说，最直接的受益，主要落实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自由表达以及业余写作成为可能。对于写作者来说，拟想读者以及传播途径的存在，并非无关紧要。除非你想藏诸名山传之后世，否则，都会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地带入审查官或编辑们的眼光，因而无形中为自家的思考与论述设置了方向与禁区。除了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有学界同行虎视眈眈的目光，使得你心照不宣地依某种成规写作。前者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容易引起反感；后者在目前的中国，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界普遍对其副作用缺乏警惕^[11]。对于以知识增长、精神解放和人格独立为终极目标的人文研究而言，任何“学术规则”（即便目前行之有效）都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挑战，并做出相应的调整。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者的思考与表达更具弹性，学科的发展方向因而也就更难预测。而且，我赞同萨依德（Edward W. Said）的说法，即工具理性与专家崇拜正越来越成为保持知识分子情怀的最大压力，而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不为利益或奖赏所

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有可能部分化解这种紧张^[12]。因此，为中才设立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我以为不但必要，而且可能。而这，恰好与网络文化的观念与功能相吻合。

其次，网络在中国的普及，极有可能打破凝定的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学术/文化格局。此前，虽然上海、广州、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高校集中的大城市，都聚集了许多志向远大的学者，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全国的人文学术中心在北京，这一点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这是因为，除了人才相对集中、文化传统深厚外，北京的藏书丰富、信息便利、思潮激荡，都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北京“得天独厚”的这一优势，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正逐渐为其他地区的学者所共享。所有的学者，无论身处何地，均可借助互联网，获得与北京学者几乎同样多的信息，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走。这几年，我有幸在国内许多大学讲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不同地区学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思考基本同步。这一刚刚呈现的大趋势，对于迅速提升学术意义上的“边远地区”之研究水平，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知识生产不等于信息交流，重绘学术版图，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对于中国学界“独尊北京”心态的逐渐消解，以及极有可能出现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我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第三，由于网络的“超文本”（Hyper text）特征，使得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任何一个初次上网自由浏览的读者，都会为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由追踪某一感兴趣的命题而跨越现有的学科边界。鼠标（Mouse）一动，穿越时空，所谓的古今、中外、神人、生死的边界，似乎都变得十分模糊，一不小心就越界，更不要说文学、史学、哲学这些人为划分的知识类型。过去的读书人讲究“漫游书海”，坚信能有机缘在藏书楼或图书馆里“随便翻翻”，眼界必定大为开阔。我曾写文章批评中国的大学图书馆普遍实行“闭架借阅”，使得学生眼界狭窄，思维严重受制于教科书以及既定的学科分野^[13]。在我看来，允许学生们在书库里自由走动，拿起或放下任何一本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图书，这种随心所欲的阅读，不只是开拓视野，更可能触类旁通。而现在，相对于大学图书馆工作方式的迅速改进，网上的自由浏览无疑更具革命性。首先是感兴趣的阅读，而后才是学术性的思考，伴随着互联网长大、习惯于在网上“自由冲浪”的一代，必定以其桀骜不驯的姿态，对现有学科划分的合理性提出巨大的挑战。这与前辈学者之意识到具体学科的局限，然后小心翼翼地“跨学科”，会有很大的区别。而超媒体（Hypermedia）的实现，更使得文字·图像·音响三者的结合轻而易举，且“天

衣无缝”。由此而导致图文并茂、动静相宜的知识传播与接受的图景，极有可能催生新的学术意识与知识框架。

在承认电脑及网络给人文研究带来巨大便利与刺激的同时，必须意识到，新时代学者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并不能保证其必定在学术上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人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处^[14]，在于其对学者个人的意志、慧心、悟性、情感以及想像力有较大的依赖。而在这方面，很难说一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先进的技术手段，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永远只能是辅助工具，而非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反过来，由于电脑及网络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甚至有点担心，数码时代的人文学者，可能面临记忆力衰退、历史感淡薄、独立性减少等诸多陷阱。

由书斋里手不释卷的读书人，转为屏幕前目不斜视的操作员，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并非毫无顾虑。我相信，不少人会有这种感觉：使用电脑而且上网以后，记忆力明显下降：本该脱口而出的人名地名，居然需要花大半天琢磨，且不见得能够如愿；需要动笔写作时，不是缺点少划，就是面目模糊。我们这一代，毕竟是在纸与笔构成的围墙下长大，尚且有此烦恼；下一代、再下一代呢？是否会有这么一天，脱离电脑的“读书人”，既缺乏记忆，更无法写作？理论上谁都明白，电脑不过是人类聪明才智的凝聚；可对具体的人来说，电脑的超级记忆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不由你不臣服，也不由你不依赖。原先经由寒窗苦读和冥思苦想方才可能逐步接近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如今被轻易到手的数据库所取代，你感觉如何？“当全世界的知识都可以声色俱全地通过电话线或者电缆像自来水一样廉价和方便地流进你家的时候，你还用得着辛辛苦苦地去买书交学费上学堂吗？作为老师，我忍不住要打一个寒噤。”^[15]对于严锋的忧虑，我也有同感。不是妒忌今人及后人不必经由苦读就能获得知识，而是担心作为人生教育重要一环的“求知”变得“形同虚设”，因而影响学生们意志及人格的养成。

过去，当我们谈及某老学者博闻强记，经史子集脱口而出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而随着电脑的普及以及软件业的迅速发展，总有一天，每个现代人身上都可装备功能强大的数据库，要什么给什么。到那时，还哼着“小呀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是不是显得很滑稽？以前引以为傲的博学，如今只需“举手之劳”，在我，真的是喜忧参半。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坚实的过程”被“虚拟的结果”所取代。不想沉潜把玩，只是快速浏览，那还能叫“读书人”吗？如果有一天，人文学者撰写论文的工作程序变成：一设定主题(subject)，二搜索(search)，三浏览(browse)，四下载(download)，五剪裁(cut)，六粘贴(paste)，七复制(copy)，八打印(print)，你的感想如何？如此八步连环，一气呵成，写作(Write)与编辑

(Edit) 的界限将变得十分模糊。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对人文学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不要说凝聚精神、发扬传统、增长知识的功能难以实现，说刻薄点，连评判论文优劣以及是否抄袭，都将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谁能保证这篇论文不是从网上下载并拼接而成？

这当然只是一种极而言之的推论，而且带有明显的自嘲成分。可这个戏谑本身，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作为人文学根基的“含英咀华”，正受到“快速浏览”的强有力挑战。这种即将浮出海面的喧嚣与骚动，有可能改变我们看待知识的眼光、培养人才的途径以及评价著述的标准，故不能等闲视之。

因“不出版，就死亡”的生存压力，当代学者倾向于为写作而读书，这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连读书也免了，需要什么资料，让电脑代为“搜寻”就得了。表面上看，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引文规范，注释详尽，参考书目极为可观。可同行应该心知肚明，“读书”和“查书”，感觉就是不一样。我预感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聪明人”，不再耐烦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读了。可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阅读”本身便是一门学问，远不只是找寻与论题相关的资料，更包含着体会、反省、怀疑、选择。成熟的学者，既有一目十行的“随便翻翻”，但更看重朱熹所说的“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的阅读。假如古人所追求的沉潜把玩、含英咀华，完全被吹着口哨的随意浏览所取代，那绝对不是好消息。朱子八九百年前教导学生如何读书的老话，只要不过于拘泥，今日读来还真有点切中时弊：“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今之学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16]与朱熹所生活的宋代相比，今日中国的读书人，需要接受更多的知识，自然不该只是死抱几册儒家经典。但“读书苟简”总不是好事情，关键时刻，还是需要“反复玩味”的。我担心的是，由于检索工具的大为改进，著述时不难做到“瞒天过海”，如我辈意志不太坚定者，很容易养成偷懒的习惯。

有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看来，似乎应该倒过来：“书到用时方恨多”。假如你认真检索，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课题，都可能找到汗牛充栋的相关资料，以至让你彷徨无耐：读也不是，不读也不是。老一辈学者关于做学问找资料必须“竭泽而渔”的教诲，在网络时代，除了个别小题目，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情势变了，但“竭泽”的努力，作为一种“奋斗过程”，其意义依然存在。依我浅见，对于人文研究而言，“过程”很可能比“结果”更值得重视。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秀才

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方便是方便了，可“寻寻觅觅”的感觉却丢失了，未免有点可惜。就好像武侠小说里，一个志向远大的少年，必须经过独行千山浪迹天涯的修炼，方才可能成长为纵横天下的大侠。幻想着福从天降，有逍遙子老前辈将七十余年勤修苦练的神功直接灌输给你，除非像金庸笔下的虚竹那样“内功所习甚浅”，否则苦苦挣扎，非死即疯^[17]。若我辈道行不深者，真有点担心被各种神功速成的许诺所诱惑，以至于心旌摇动，走火入魔。

将读书的“过程”说得那么重要，是否夸大其辞，这取决于对求学目的的理解。在我看来，“信息”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人生智慧”以及“生命境界”。前者属于公共资源，确实可以金钱购买；后者包含个人体验，别人实际上帮不了多少忙。十多年前，复印机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大学校园里出现“贵族学生”，不必听课，到了学期末，复印同学的听课笔记，照样可以安然过关。那种委托别人听课的小把戏，比起今日之占有数据库而迅速“博学”，实在不值一提。可我还是坚持原先的想法，就像吃饭一样，最好还是亲自品尝。以目前的医学水平，别人的口感与味觉，无法传递到我的神经中枢。除了资料的抄录、搜寻、归类、整理等，真正有价值的人文研究（从命题到主旨，从论证到精神），我不相信“万能的电脑”能够代劳。即便有一天，人工智能化达到这样的地步：只需给出一个命题，电脑就能自动工作，并生成一篇逻辑严密、文采斐然的文章，我也不觉得“亲自读书”是多余的。

因为读书除了获得知识，还有养成君子的功能。“君子”的提法，稍嫌笼统，不太好严格界定。但因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时尚用语在先，中国人一般不难心领神会。过去说“博雅君子”，也可理解为书读多了，眉宇间自然流露出一股无法掩饰的书卷气。这里不想讨论“书卷气”的好坏——因那很可能见仁见智，只说“快速浏览”造成“虚拟的博学”，同时割裂了原先合而为一的获取知识与养成人格。其结果很可能是：“博雅”（先不问真假）易得，而“君子”（暂别定高低）难求。缺了“涵养性情”这关键性的环，读书降为谋生手段，人文研究成了纯粹的课题制作，对于许多“别有幽怀”的人文学者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行文至此，已近“盛世危言”，为公平起见，必须实行自我解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颇有力主“将吾国载籍，编成索引，则凡百学子，皆可予取予求，有径探寻，岂止事半功倍”者。此举虽有章学诚、汪辉祖、阮元等作为“先觉”，但中国“索引运动”之得以形成，还是借鉴西方学术，提倡科学方法的结果^[18]。此举受到“饱读诗书”者的批评，理由正是索引诱人不读书，且“开后人无限抄袭法门”。对此，积极从事索引编纂工作的

洪业，在《引得说》中严加痛斥：“若以学者取用此类工具为病，则诚昧于学术进化程序也。……图表者，目录者，引得者，予学者以游翔于载籍中之舟车也。舟车愈善，则其所游愈广，所入愈深。且减其手足中之劳，而增其师友蹉磨之便，博约深精可期也。童年而事记诵，白首然后通一经，何足以应今日之需要哉？”^[19]索引作为一种“助人善读其书之工具”，对现代中国学术之形成与发展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我不想因此而全盘否定反对者的警告。如果没有那些“偏颇”而“痛切”的批评，后来的成功者，当初未必有足够的自我反省的精神与能力。在这个意义上，“逆潮流而动”的批评者，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正像索引的出现曾引起饱学之士的不满，但学问并没到此结束，而是掉转船头，另外开辟新的天地。电脑及网络给人文学者所带来的，同样是危机与生机并存——严格说来，技术进步本身并无过失，过失在于使用者的不加节制与缺乏反省。作为新世纪的人文学者，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回避网络文化，但必须牢记老祖宗的古训：“是药三分毒。”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变革，关键在于知其利也察其弊，方才可能腾挪趋避，最大限度地获益。

“数字化生存”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绝非区区小文所能论述。我只是认定，自觉承担“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学者，其对于网络功能的基本判断，很可能不像自然科学家那么乐观，更不要说与传媒和大众之间存在隔阂。我们的责任，不是表达对于“网络”这个独领风骚的“当代英雄”的赞赏或鄙夷，而是努力去理解、适应、转化，尽可能在趋利避害中重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与学术。

当然，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网络这匹狂傲的野马，其驰骋方向，根本不以人文学者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即便只是提出问题，引起关注与思考，也都值得。

2000年5月22日于京北西三旗

注释：

[1] 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上网人数为890万。而据2000年5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新经济”竞争》称：“目前，中国的上网人数已超过1000万，而且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预测到2002年，中国将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2] 在中国文化界影响甚大的《中华读书报》，原有专业色彩很浓的专版“电脑时代”，现改为相对普及的“网络时代”（Web Century）。

[3] 刘波等编著的《Internet上的各类常用资源》（清华大学出版社）主要介绍当前网络上的热门站点，2000年修订版包括的资源总量近3700条，120余类，涵盖了有关

Internet 的各个领域，其中近 2000 条是国内的，由此也可见中国确实进入了“以网络为中心的计算机时代”。

[4] 在当代中国 IT 界很受欢迎的评论家方东兴，其文章结集为《骚动与喧哗》（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 年）、《数字神坛》（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 年）、《起来》（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 年）。三书的副标题很能说明其立场与思路：“IT 随笔”、“计算机业批判”、“挑战微软霸权”。方君思考的重点是中国计算机业的发展，只是在介绍西奥多·罗丝托克的《信息崇拜》等书时，略为质疑计算机神话。

[5] 参见摩尔著、王克迪等译：《皇帝的虚衣》一书的前言及第 14 章“回归自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6] 参见比尔·盖茨著、蒋显 等译：《未来时速》，第 379 页、382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7] 艾伦·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如此描述人文学教授令人困窘的两难境地：“无论喜欢与否，他们实质上一直从事阐释和传播传统经典论著的工作，致力于保存我们所谓的传统，而且是在一个并不十分看重传统的民主体制下。他们是一伙闲散和优雅之徒，却置身于一个追求明显的功利和效用的社会。他们的王国是在永恒和沉思冥想之际，可是其社会背景却注重的是此时此地与行动。他们关于正义的信念是平等主义，但同时又追求骇世惊俗，精益求精，超凡入圣。”参见艾伦·布鲁姆著、缪青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 377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3 月。

[8] 如刚刚开通的中华读书网 (<http://www.creader.com>)，便设有以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为主的纯学术周刊，每期四五十万字，包括“学术话题”、“学术批评”、“学术文萃”、“书生之见”、“学问之道”、“学者档案”、“学术信息”、“书林集锦”等栏目。

[9] 参见廖集玲：《古书重换了青春——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使用记》，《中华读书报》1999 年 12 月 8 日。

[10] 参见陈玲：《数字图书馆：信息时代的知识英雄》，《中华读书报》2000 年 5 月 10 日。

[11] 我始终认为，在提倡学术规范的同时，必须保留自由思考与随意写作的权利：“建立规范是为了超越规范。‘规范’在其方生未死之际最有魅力，一旦成型并建立起权威，对探索者又是一种压制。只是针对如今蔑视传统不守规则的时尚，才有必要再三强调学术的规范化。学术走上正轨，规范化局面形成，那时又得强调超越，怀念那些胆大妄为的‘野狐禅’。”（《超越规则》，《读书》1992 年 12 期）

[12] 参见萨依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第 115—121 页，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7 年。

[13] 参见《书海遨游之梦》，《瞭望》周刊 1992 年 26 期。

[14] C. P. 斯诺关于人类知识分裂为两种文化，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的描述，以及对于沟通科学与人文的“第三文化”的呼唤（参见斯诺著、纪树立译：《两种文化》，第 4 页、68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固然值得重视。但在目前中国学界，对于“科学”的想像，以及“科研基金”的申请、“学术

成果”的鉴定等，基本上是依自然科学的准则略加变化，而很少真正考虑人文学的特征。

[15] 严锋：《现代话语》，第156—16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

[16] 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十一，第161—1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7] 参见金庸：《天龙八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31章“输赢成败，又争由人算”。

[18] 参见何炳松：《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史地学报》三卷八期，1925年10月；万国鼎：《索引与序例》，《图书室学季刊》二卷三期，1928年6月。

[19] 参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第21—2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